

略论中共领导的北方早期工人运动

肖 甦

【摘要】中共建党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率先投入工人运动的重大实践,为北方工运奠定了基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北方分部领导北方铁路工人、开滦五矿大罢工,是全国工运发展最快成绩最显著的地区,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总结“二七”斗争教训,取得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中共领导;大罢工

A Short Treatise on the CPC-Led Early Northern Labor Movements

Xiao Shen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early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Beijing first plunged into the important practice of labor movement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northern labor movements. After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hina Labor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Northern Branch led the large-scale strikes of northern railway workers and Kailuan's five mines in the region where labor movements developed fastest and achieved the most prominent results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rst climax of labor movements around the country. Through leading the strike of Beijing-Hankou Railway workers and summarizing lessons from the "February 7 Massac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btained precious experience in carrying out revolution in China.

工人运动在中共建党时期占据特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其一,工人运动是中共产生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其二,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就是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建党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下简称北京党组织)率先投入工人运动的重大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兴起。建党后,在中共北京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以下简称北方分部)领导下,掀起北方工人罢工潮,是全国工运发展最

快成绩最显著的地区,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中共领导的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略作梳理和论述。

一、大力促进北方工人运动初起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对先进知识分子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响亮口号,开始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自身转变。

(一) 党从事北方工人运动起步于长辛店

北京党组织从事工运起步于长辛店。长辛店位于北京西南,距市区40里,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这里拥有二千三百余名工人的大型企业铁路机厂(今二七机车车辆厂)。五四运动时期,长辛店工人就成立了“十人团”组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北京党组织决定从铁路工人集中的长辛店入手,开展工人运动。长辛店作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党最早开辟工运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主要成绩有四:

第一,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北京党组织多次派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到长辛店,与史文彬等工人联络交谈,经过磋商,决定以工人名义发起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学校的经费由“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起募捐,教员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往。1921年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工人开办,日班为工人子弟开办。最初入学者有百余人,至11月来校学习的工人达530人。常驻教员吴汝明,其他教员有李梅羹、王复生、李骏等。这是中共建立最早的一所工人学校,“是我们党在此地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①随后在天津、洛阳、唐山、张家口等北方地区,均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最早的起点之一。

第二,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会。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一千五百多名铁路工人举行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散发《五月一日》《我们的胜利》两种小册子。会上通过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改称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一工会初期组织,加入者日益增多,会员由三百四十余人增至一千二

百余人。长辛店工会的成立,为北方各铁路建立工会组织打下了良好基础。各处纷纷派代表来长辛店参观学习,使工会组织发展到京汉铁路各站。与此同时,上海党组织成员李启汉等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劳工半日学校”。邓中夏指出:“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②

第三,出版《工人周刊》。北京党组织于1920年11月出版工人刊物《劳动音》,几个月遭到查禁后,决定以长辛店工会名义创办新的通俗刊物《工人周刊》,于1921年7月在北京创刊,其宗旨是:描写工人的疾苦;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导工人组合的方针及计划。^③主要报道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劳动界状况,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开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该刊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每期印行2000份,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上海《共产党》月刊曾称赞《工人周刊》:“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棵明星。”^④自第15期起,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报。

第四,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党小组。为培养骨干力量,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铁路工会中发展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第一批工人党员,建立了党小组。这些工人党员都是工会和罢工运动的领导力量。

(二) 北京党组织领导唐山、天津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北京党组织除了在北京周边的长辛店、南口、丰台等地从事工运外,还多次派党团员到唐山、天津、太原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和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5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17页。

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页。

④ 《共产党》第六号,1921年7月7日。

青年团组织,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北方工运的基础。

唐山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又一发祥地,也是北京党组织最先开辟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这里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今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厂(今唐山启新水泥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合计3万余工人。从1920年底开始,北京党组织先后派邓中夏、王尽美、罗章龙、彭礼和等多次到唐山指导工人运动,了解唐山工人的生活状况,联络唐山制造厂工人领袖邓培等酝酿组织工会。北京革命局负责人柏烈伟和张国焘还委派天津青年团员谌小岑来唐山,联络邓培等,酝酿组织工会问题。1921年3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改为职工会,邓培当选为委员长。这是党在北方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1921年秋,罗章龙介绍邓培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北方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是年冬,北方分部又派北大学生、青年团员李树彝为常驻唐山特派员,负责唐山铁路职工学校,并担任教员,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天津为北方工业中心,产业工人十几万人。1920年11月,受李大钊的委派,北京党组织成员张太雷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921年1月,天津青年团书记张太雷与柏烈伟共同创办了天津第一份工人小报《来报》,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外新闻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为主要内容。^①此外,还发售《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并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该报出版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法租界巡捕禁办,后又改名为《津报》,继续坚持出版。

此外,北京党组织还在北方各地指导工运和组建青年团。在太原,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和青年团的委派,多次回到太原,指导王振翼、贺昌等进步青年,于1921年5月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②在济南,据最近发掘的史料王统照《民国十后日记》记载:1921年4月,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曙光》杂志主编宋介秘密指

导建立了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由王志坚、邓恩铭负责。^③济南早期党组织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等,经常深入工厂,于5月创办劳动周刊社,出版《劳动周刊》,6月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在郑州,1921年春,李大钊亲赴河南郑州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并向郑州工人夜校(郑州铁路职工学校)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④

由上可见,北京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二、全力领导北方第一次工人罢工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后不久,便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相继设立了分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分部全力以赴领导罢工斗争,在1922年一年里,各地罢工风起云涌,高潮迭起,大小罢工有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多万人,形成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

北方工人罢工斗争,是中共北京地委通过北方分部领导进行的。北方分部于1921年11月1日在北京成立,罗章龙任书记。最初管辖长辛店、天津、唐山、陇海铁路沿线四个区,并联络张家口、石家庄、顺德、信阳等地区。直接管

① 谌小岑:《我在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未刊稿),1975年。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③ 阎化川、李开莹:《济南SY青年团新史料的解析与考证》,《中共创建史档案与文献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内部本),2014年10月。

④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理的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周刊》，间接监督的有唐山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第一校、郑州京汉同人俱乐部和陇海铁路。^①通过这些途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启发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还计划以京汉、津浦、京绥、陇海四条铁路为中心，成立各铁路工会总会，发动罢工斗争。1922年7月山东分部并入北方分部后，其工作范围扩大至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

（一）陇海铁路罢工是党领导的全国第一次大罢工

陇海铁路沿线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四大站，1921年10月各车站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即洛阳工人俱乐部、郑州京汉铁路同人俱乐部、开封老君会、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②会员合计一千二百余人，占全路工人总数的70%以上。为反对洛阳机务厂总管若里压迫和虐待工人，在工程师游天洋领导下，1921年11月17日，全路机务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发表《罢工宣言》，历数洋总管若里殴打工人、克扣工资、减发物料等十大罪状，提出撤换若里、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16条要求，并成立了陇海路罢工委员会。11月20日，陇海路全线两千余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

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地委书记李大钊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对罢工的支援办法，决定：第一，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发挥领导作用。第二，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第三，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③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派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赴洛阳、开封和徐州等地，指导罢工，同时策划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等各铁路举行同情声援罢工。

罢工期间，在罗章龙等的指导和推动下，将洛阳、开封、徐州的工人团体改组为铁路工会，还建立了纠察队。当局派军队武力压迫，工人

不屈；又以厚利相诱，工人不为所动。罢工坚持10天，取得最后的胜利，路局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胜利后，陇海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并加入了北方分部。陇海路罢工是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的大罢工，是一次空前创举，推动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称赞说：“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④

经过罢工的锻炼，罢工领导人游天洋、姚佐唐、白眉珊等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陇海铁路的第一批共产党员。随后，北方区委在沿路各站建立党支部，并开始筹划北方各条铁路的罢工斗争。

（二）组织领导北方铁路工人罢工

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系长期把持全国铁路，是一个买办政客兼财阀的集团，拥有很大的势力。奉系在1922年直奉战争失败后，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首领吴佩孚，为了笼络人心，打出“保护劳工”的招牌，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洞悉吴佩孚的这一企图，为了打开北方工运的局面，顺水推舟，决定趁机利用军阀和交通系之间的矛盾。1922年5月，李大钊征得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的允许，推荐共产党员包惠僧、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袁子贞六人，分别到京汉、京绥、正太、京奉、津浦、陇海六条铁路秘密开展工作，以公开身份“密查员”作掩护，“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并且收到了一定的实效，“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第459—460页。

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第475—477页。

③ 罗章龙：《陇海路大罢工》，《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9页。

④ 罗章龙：《陇海路大罢工》，《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第54页。

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①

此外,北方分部还先后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其他“特派员”,如吴汝明、凌楚藩等在京汉路,游天洋等在陇海路,王尽美、王麟书等在京奉路,王仲一等在津浦路,郭恒祥等在胶济路,安幸生等在天津,萧明等在北京,李树彝、彭礼和等在唐山,黄平万等在郑州,李慰农等在济南,等等,^②进一步奠定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基础。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遂形成北方铁路工人罢工风潮,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大的罢工略述如下:

(1) 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受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影响和鼓舞,1922年8月,邓中夏、史文彬在长辛店主持各路代表三千余人集会,向京汉铁路局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8项条件,同时宣布成立罢工委员会。由于铁路局迟迟不予答复,邓中夏、史文彬又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于8月24日罢工。当天,全路三千余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实现后,京绥、京奉、正太、津浦等各路,表示慰问和声援。罢工至3天,铁路局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此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③随后,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掀起了罢工风暴,并直接促成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2) 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罢工。1922年8月,北方分部副主任兼秘书王尽美,以京奉路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今山海关桥梁厂)领导罢工。在王尽美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10月4日山海关铁工厂一千余工人举行罢工。9日,全厂一千多名罢工工人全部躺在山海关车站的铁轨上,截住了途经山海关的全部列车,最后迫使当局承认工人要求条件之大部分。罢工历时9天,取得了胜利。这是京奉铁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对于京奉路唐山制造厂罢工和开滦五矿大罢工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3)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1922年初,北京党组织和北方分部派何孟雄到南口、张家口等地,直接负责领导京绥铁路工人运动。他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同时组织工人夜校和工人文化补习班,并亲自给工人编写课本。在何孟雄的指导下,先在南口铁路机车厂建立“工业研究所”,又在张家口机务工人建立了“精业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技术的组织,实际上是铁路工会组织。8月,在张家口建立了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并在全路各车站设立八个分所,会员有六百余人。10月27日,何孟雄领导全路一千五百余名车务工人举行罢工。28日,机务、警务两处全体加入罢工。罢工两日,迫使铁路当局答应工人罢工时提出的全部要求。这次罢工的胜利,振奋了北方工人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4)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颁布《劳动法大纲》,号召各地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为此,北方分部派彭礼和、吴先瑞、罗章龙、邓中夏、王尽美、李树彝等多次来唐山指导工作。由罗章龙、王尽美和邓培3人组成最高党团,负责领导唐山和山海关两地工人的罢工斗争。^④10月12日,唐山地委召开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罢工,成立由邓培任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纠察队、调查队和守望队。10月13日,在邓培领导下,唐山制造厂三千余工人举行罢工。铁路局和厂方勾结,以各种软硬手段,破坏罢工,均未得逞,罢工坚持8天,厂方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胜利后,在京奉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6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5页。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7页。

④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6期。

铁路沿线各站普遍建立起工会组织,并于1923年初在唐山成立京奉铁路总工会,邓培被选为委员长。

(5) 正太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初,北方分部派张昆弟以特派员身份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首先在正太铁路机器厂工人中发展党员,指导协助孙云鹏等成立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10月,在石家庄正式成立正太铁路总工会,张昆弟任党团书记,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会。12月15日,张昆弟领导石家庄总机厂(今车辆厂)一千余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期间,得到各地工人的声援。罢工持续12天,获得了完全胜利。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与北方工运相关的大事,一是唐山工人图书馆的成立。在唐山地委和北方分部指导下,1922年2月设立唐山工人图书馆。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工人图书馆之一。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和图书馆主持人阮章,经常来这里向工人灌输新的思想,介绍中国工人运动及苏俄革命和建设情况。同时党团员常以阅览书报作掩护,来这里汇报工作和领受任务。工人图书馆既是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的理想场所,又是党组织和工会的秘密联络据点。二是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的开办。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1年9月,于树德等开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1922年3月,北京区委派陈为人来津指导工作,在校内建立青年团天津支部。校内还设立“五五书报代卖社”和“工人图书馆”,深受青年工人的欢迎。该校与数百工人建立了关系,成为党领导天津工运的一个基地,被誉为“天津劳工的一道曙光”。^①

(三) 全力以赴领导开滦五矿大罢工

开滦五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包括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五处,共有三万余工人,年产量四百余万吨,占当时全国煤产量的20%。1922年初,北方分部开始在开滦煤矿工人中开展工作。受山海关铁

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胜利的影响和鼓舞,开滦五矿工人因不堪外国资本家之虐待也准备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邓中夏和特派员彭礼和、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唐山地委书记邓培等领导了这次大罢工。罢工之前,成立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罢工的最高领导是由罗章龙、王尽美和邓培三人组成的中共党团,罗章龙任中共党团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对外仍用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②10月23日罢工开始,参加者由三千七百余猛增至三万余人。26日,要求释放被捕的纠察队员的请愿工人遭警察枪杀,当场打死6人,轻重伤57人,失踪者31人。^③惨案发生后,罢工指挥部以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同盟罢工第二次宣言》,引发全国各地的激愤与支援。在邓培等的领导下,28日,启新洋灰公司八千余工人和华新纺织厂工人,联合举行声援开滦五矿的同情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安源路矿俱乐部、山海关工友俱乐部、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等,纷纷进行声援和募捐活动。11月5日,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被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令查封,有8名工人及特派员彭礼和等遭逮捕,唐山制造厂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也被查封。罢工坚持了25天,最后不得不忍痛复工。这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一度使开滦煤矿陷于完全停顿状态,但最后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除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镇压外,邓中夏认为:“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④

开滦五矿罢工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中夏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

① 《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9日。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02页。

③ 天津《泰晤士报》,1922年11月5日,转引自王士立:《邓培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64页。

罢工之一”，使全国罢工高潮“达到最高峰”。^① 罢工虽然失败了，罗章龙认为：“中国工人受到了很深刻的锻炼，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数万先进产业工人与北方区委党组织成员，在与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中，团结一致，出生入死，蒙受重大牺牲，坚守岗位，与敌长期周旋，博得中外革命团体的赞扬，实具有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还说：“面对强大的敌人，坚持二十五天的激烈鏖战，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点，为当时的中央会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一再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强大威力，已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认识到工人革命力量不可轻侮。这次长期的大规模斗争对于北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继陇海铁路大罢工后又一次创举，其业绩足使青史留辉。”^②

三、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总结“二七”斗争教训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进行的，使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峰。中央特派代表张国焘为总负责人，罗章龙任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武汉分部和北方分部分别负责领导南北方的工作。北方分部的史文彬、吴汝铭、凌楚藩、高彬、康景星等都是主要路段的负责人。

（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和京汉铁路大罢工

在京汉路沿线 16 个站成立的工会，会员达 1.3 万人时，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就成为必然的共同要求。1922 年 4 月，会员们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第一次会议，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军阀吴佩孚对此事胆战心惊，恼羞成怒，撕下“保护劳工”

的假面具，下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集结开会，同时“约请”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派代表来洛阳谈判。对此，罗章龙召集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震瀛、项英、吴汝明、李求实等人开会，讨论应对措施，决定一面公开社会舆论，揭露反动势力的破坏阴谋，一面派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等五名代表前往洛阳与吴交涉。但谈判相持三个小时，未有结果，谈判代表返回郑州后，即刻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一致决议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如期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

2 月 1 日，郑州全城戒严，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一千三百余人，不顾军警的恫吓与阻挠，冲破重重包围，进入会场，在紧张气氛中，会议主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会后，与会代表和工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此刻，反动军警强行解散游行队伍，捣毁匾额，封闭总工会会所，占据各地代表的住所。当晚，张国焘和罗章龙等主持召开党团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成立由李震瀛、杨德甫、史文彬、高斌、张国焘 5 人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二，2 月 4 日开始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三，总工会由郑州迁移至江岸办公。^③

京汉铁路三万余工人于 2 月 4 日举行全路总罢工，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罢工期间，郑州分会负责人高斌、刘文松等被拘留；长辛店分会负责人史文彬、吴汝明等 11 人遭逮捕。7 日，吴佩孚调集 3 个师的兵力，分别于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进行血腥屠杀。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这次骇人听闻的屠杀，全路共有 44 人死亡，三百余人负伤，四十余人被捕，一千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 79、23 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 220、221 页。

③ 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第 376 页。

余人失踪,史称“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罗章龙组织力量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以惊人的速度于3个月内编著出版长达九万余字的《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这本小册子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流血斗争,有力地揭露了军阀当局的凶恶面目。罗章龙在序中写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虽然其结果令人失望和沉痛,但在中华民族革命史上,“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①该书先在北京印5000册,后重印多次,共印刷五万多册,畅销南北,产生过很大影响。《工人周刊》指出:“大家要想明了京汉工人奋斗的真精神和军阀惨杀劳动界的详细情形的不可不看本社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②罗章龙回忆说:“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③该书至今仍不失为颇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二)“二七”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正如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书李震瀛所指出:“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运动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④这次大罢工,不仅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极其沉重的打击,而且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牺牲精神及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提高了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党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觉醒。共产国际当时称赞: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⑤

“二七”斗争的失败,对中国革命的发展

和影响是巨大的,党从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提高了对于工人阶级重要性的认识。“二七”失败后,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对工人运动产生悲观、动摇和怀疑。对此,邓中夏认为“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无论形势如何变更,“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还说:“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⑥陈独秀指出:“中国劳动阶级不独在自己阶级争斗上,而且在国民革命上亦甚有力量。……如果缺乏他们,革命就完全无望。”^⑦罗章龙在《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序”中写道:“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⑧

第二,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二七”斗争失败表明:只有工人阶级的英勇奋斗,而缺乏坚强的政党来领导,革命仍不能取得胜利。这次罢工虽说是中共领导的,但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还不到50人。邓中夏认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罢工失败“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

① 《京汉工人流血记》,《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第439页。

② 《工人周刊》第64期,1923年5月23日。

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65页。

④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302页。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铁路工人宣言》,《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⑥ 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9期,1923年12月15日。

⑦ 《在京汉路被难工友追悼会上演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⑧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第439—440页。

个强大的共产党”。而“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①高君宇提出：“我们只有完固有力的工会，还是不够奋斗的”，“现在一切政治团体，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②

第三，必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经历“二七”失败，党开始认识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③所以，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单靠工人群众的孤军奋战是不能取胜的，还必须有其他各革命阶级的援助，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指出：全国各阶级

各党派，“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④

综上所述，党领导的北方早期工人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惨痛的失败。无论是胜利或失败，党都能及时认真地加以总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指导工人阶级战胜各种困难和敌人，不断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北京区委和北方分部在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树立了政治威信，发展了工人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人骨干，使党的阶级基础更加巩固，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重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原国防大学教授）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105—106页。

② 君宇：《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第580、581页。

③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④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中共一大各地方组织报告研究

谢荫明

【摘要】中共一大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地方组织报告成立后的活动情况。但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对此均语焉不详。本文依据尽可能多的材料,对中共一大上哪些各地方组织做了报告、报告的时间、报告的内容、报告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从而加深了对一大前各地方组织情况、一大议题的形式和内容的认识,肯定了党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中共一大;地方组织报告;时间内容;研究考订

A Study on the Reports of Various Local Organizations to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e Yinming

Abstract: One important item on the agenda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as various local organizations' reporting of their activities after establishment, but historical fi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parties concerned contain no detail about this. This article studies which local organizations reported to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time of reporting, the contents of their reports, and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heir reports, carries out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on *Report of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Beijing* and *Report of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Chongqing, Sichuan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independent judgments, thu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s of various local organizations before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the topics for discussion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and affirming the Party's precious experience.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在危险的环境中,完成了制定党纲等一系列重要议程,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开端。

对一大召开时间、参加人员、会议上的争论、通过的决议以及一大历史意义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

对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报告,专门的研究却很少。

作为珍贵的一大文献资料,地方组织的报告和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一起,收藏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1957年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现存中央档案馆。原件为俄文本,1958年后译为中文,曾请董必武等中央

领导帮助鉴定和回忆。与上述文献内容基本一致的英文本,附于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1月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于196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俄文本和英文本都已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随后,有学者分别对其中《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和考证。^①

但这些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关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情况,还有许多历史疑团需要破解,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更可以从这些报告及报告的方式中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一大上各地方组织报告的时间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和会议代表的回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留日学生七个中共地方组织的代表13人,国际代表2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代表们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在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国际代表马林、尼科斯基致词后,一大代表商定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安排,决定:每天上下午开会;为了安全,会场要经常变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听取各地方组织的报告、制定今后的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领导人。

由于党纲的起草准备不足,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完全一样,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党纲起草委员会从事这项最重要的工作。于是在第一天会议余下的时间里,安排各地方共产党组织向大会作报告。由于时间不够,第二天的会议继续进行各地方组织的报告。

一大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述了大会的安排,“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共用了两天时间。”接

下来的两天没有开会,为的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②在1921年7月30日晚上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发生了会议场所被搜查的事件,随后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完成了代表大会的所有议程。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各地共产党地方组织报告均是在一大召开的第一天或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完成的。

二、哪些地方组织在一大上作了报告

根据保留下来的一大文献中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根据与一大其他文件的印证和一大代表们的回忆,这两个报告是真实的;而且是在大会上讲过的。除了北京、广州两地在一大上作了情况报告外,笔者认为上海、长沙、武汉、济南,甚至留日的中共地方组织都在会议上作了报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其他五地方组织的报告文字稿,但我们是可以从相关资料中找到线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会议“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③张国焘回忆“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态,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④包惠僧回忆“各地区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⑤上海发

① 见《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4期,谢荫明文;《江淮文史》2014年第6期,李致宁文;《开放时代》1984年第5期,李达德文。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8页。

⑤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59、161页。

起组负责人李达回忆：大会的第二天，“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初期，一大上听取全国各地方的情况报告和综合情况报告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会议开始时的时间安排很充分，从现存北京、广州党组织报告的篇幅看，也不可能占用一天半的时间。

如果各地方组织都作了报告，那么报告的人都是谁呢？从一大文献的内容、语句和回忆材料的分析上看：

北京组织的报告人是张国焘。

广州组织的报告人是陈公博。

武汉组织的报告人是包惠僧。因为包曾任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到广州协助陈独秀工作一段后，陈还要派他回湖北。^①

长沙组织的报告人应当是毛泽东。有人回忆何叔衡在会议开始不久就离开了，毛是大会秘书，他在会议上讲过话。

济南组织的报告人是谁，王尽美抑或邓恩铭，因为没有材料，不得而知。

留日组织的报告人应当是周佛海，因为他是从东京来参会的惟一代表，又是另一位大会秘书。

上海发起组的报告人是李达。因为原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李汉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辞职不干；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了李达，李达负起了一大会前召集和会上与会议主席协调配合的责任，除了报告上海组织的工作外，很大的可能还代表发起组作了总体的报告。所以他对各地方组织报告的内容也很在意，“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②

当然，现存地方报告文献只有两种，也就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一大上只有北京、广州两个

地方组织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情况报告。因为这两地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在工人和学生中的组织工作比较扎实，活动比较深入。又因为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党的创始人没有参加会议，而他们当时分别居于北京和广州，对当地的组织指导得比较直接。所以，选取这两地代表作了比较细致、全面的报告，而其他地方组织的情况和经验，有可能在会议的讨论中交叉进行。上海共产党组织因为是党的发起组，他们在作“总情况的报告”的同时，介绍上海地方的情况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即使一大后的中共中央局，也依然兼有上海支部的职责。^③

三、《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不是一大上的报告

和这组一大文献保存在一起的，还有一份名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文献的题目、年代和保存的卷宗来看，貌似一大上又一份地方组织的报告。但细细一分析，很多地方与中共一大不相干。一是内容上不符，重庆报告中讲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情况，包括在四川各地的组织系统与一大时的各地中共组织发展情况不一致。这在一大其他文献和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中都趋于否定。二是人员不符，重庆报告中提到该“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个候补成员”，又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这和一大时党员的状况、代表的组成不一致。三是制度不符。在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发展的程序上，主要看发展对象的政治态

① 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305页。

②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回忆》（1955年8月2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07页。

③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回忆》（1955年8月2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08页。

度,一般没有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不像《重庆报告》所说“至少须有我们组织的两个成员介绍,并经过五六个月的候补期。候补期满,如果认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者,应经全体大会决议,发给党证”。四是成文时间不符。《重庆报告》所说川滇军阀在1920年四川的争夺的过程和影响,发生于1920年春,结束于该年的9、10月以后,完全超出一大召开时间的下限。五是地点不同。根据上下文分析,报告的地点不是在上海。“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①报告很有可能是在俄国的某个地方做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川重庆的这份报告可以是当地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总结,这个团体可以号称共产党,这个报告可以是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报告不是中共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之一。

四、各地方组织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年之后,在中国五四运动两年之后,在中共各地方组织成立尚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一大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

各地方组织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各地方的社会分析和组织面临的形势。如北京的报告中,叙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民众的心理和当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各地代表作工作报告,也讲了各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我们的工作活动和自然环境等情况”。^②

第二,党组织建立的过程,党组织成立后的活动和计划。北京的报告详述了组织成立时的情况,“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

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励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③广州的报告讲“去年年底,……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即维经斯基——作者注)。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广东群报》——作者注)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④上海讲:“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据李达回忆)

第三,组织工人的方法,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北京在长辛店组织劳动补习学校,发动工人罢工。广州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

第四,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各个地方组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主张,纷纷出版和发行各种理论和通俗书刊。

第五,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地方组织都提到了发展党员、进行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普遍认为“党员极少必须增加”,要加快发展党员,特别是工人成分的党员。

五、《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十一问

从文献的来源和内容看,《北京共产主义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8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23—24页。

织的报告》是北京出席一大的代表在一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或报告,以后由发言者或与会者记录下来,翻译成俄文,转交在共产国际保存。此报告为俄文打印件,共10页,字为紫色。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北京报告》)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分析了民众中的革命情绪,介绍了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是后人研究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及其历史的宝贵资料。

但由于这份文件没有载明具体的报告时间,没有收发文机关,作者未具姓名,加之俄汉文字的两次转译,因此给我们的理解和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这一文献,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对《北京报告》本身及其内容做了初步考证,厘清了报告时间、报告人、内容的错讹等七八个问题。那番考证的结论,已经得到史学界的确认,为许多史著和文献所采用。二十多年之后,再看《北京报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故而将新老问题聚在一起,再做一回必要的考订。

第一,报告的时间。本文前面已进行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只是过去我认为各地方组织报告是大会第二天(1921年7月24日)开始的,现在根据更多的材料分析,应该第一天就进行了,各地方组织报告的时间持续了一天半到两天,即1921年7月23日至24日,《北京报告》尤以7月23日的可能性更大些。

张国焘回忆:一大召开后,“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①包惠僧回忆:“第二天会议由各地代表谈了一点各地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情况”。《北京报告》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最后报告临近结束时又说,“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②可以明显地看出,《北京报告》是

在一大召开不久,即还未制定出实际工作计划时,在一大全体代表会议上讲的。

第二,做报告的人是谁。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于1920年10月,最早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刘仁静、罗章龙等。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除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出外,北京共产党小组已经发展到十余人。从《北京报告》内容看,报告人应是北京组织选出的一大代表,即张国焘或刘仁静。从以下事实可进一步确定,发言者是张国焘。

其一,《北京报告》谈到对工人的宣传工作时说:“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接着报告多次提到“我们”在长辛店如何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可以肯定,报告人应是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三位教员”之一。即邓中夏、张国焘、吴雨铭(吴汝明)之一。邓中夏回忆:“1921年1月,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策划在此地开办学校,……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展,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③朱务善回忆:在长辛店“组织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及工人俱乐部,经常在那里工作的,都是由我们派去的党员或可靠的非党员,如吴汝明(后为叛徒)及王铮(北大旁听生,湖南人)等,都是那时的工运专职人员”。^④这三人中,只有张国焘参加了党的“一大”,因此在大会上用“我们”的口气介绍发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报告人,应该是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3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5、22页。

③ 《“一大”前后》(二),第80页。

④ 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98—99页。

国焘。

其二,《北京报告》中还说:“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①这里的“我”,应是报告人张国焘的自称。张国焘回忆:1920年11月底,“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事情比较稳定。……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②据谌小岑回忆:1920年12月,他曾陪同张国焘去过唐山,在那里住了三天,同邓培谈了如何组织工会的问题。^③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和报告人的说法是一致的。

第三,时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北京报告》一开始就说:“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了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微不足道。”1920年到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政局变化,指的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系和皖系之间的军阀战争和政权更迭。通过这次直皖战争,结束了皖系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在北京的统治,开始了直系军阀1920年至1924年10月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生涯。当时北京知识界一般认为皖系是亲日的,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运动一贯镇压,对其没有好感。直皖战争前后,为防止军阀政府的迫害,北京的学校先后停课、学生领袖纷纷隐匿,所以学生会和中共北京地方组织的工作受到影响。

第四,“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北京报告》认为“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这句由中文译成俄文,又译回中文的原话,可能是引自中国古圣人孔子的话:“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说的是:生来就知道的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学习的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仍然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了。这样的下等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这句译文的原文也可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中国古语。

第五,“地方的财政部”在哪里。《北京报告》提到北京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时,列举了“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其中的“地方的财政部”一词不伦不类,根据上下文,此处应该是指“财政部印刷局”,这是一个老厂,专门为政府印制钞票,厂址在北京南城白纸坊。

第六,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加入与退出。《北京报告》说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时,有无政府主义分子混入,以后他们和组织脱离退出。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指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华林、王竟林、袁明熊。其中的陈德荣并没有马上退出北京共产党组织,他至少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21年上半年,他多次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并因此被捕。1922年出狱后参加过编辑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1923年9月加入国民党。1940年前后曾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位同少将。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海南岛昌江县任县长数月后,离职失踪。

第七,“三位教员”中的吴雨铭。1921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三位教员中的邓中夏、张国焘历史上提的多,其实吴雨铭(吴汝明)当年也是风云人物。吴雨铭,1898年生,1920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负责人,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二七大罢工后被捕入狱,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参加罗章龙组织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后任张学良东北军的中校秘书。1940年加入国民党,194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去世。

第八,罗同志是谁。《北京报告》中讲:“一听说哪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20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13—114页。

③ 谌小岑:《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未刊稿)。

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这里的“罗同志”,指的是罗章龙。他在“一大”前曾多次到唐山等地的矿山去,从事组织工人罢工等活动。

第九,《劳动者》系《劳动音》之误。《北京报告》说:“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但出到第六期以后,政府禁止出版。在这个禁令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此处所说的《劳动者》系《劳动音》周刊之误。

《劳动音》周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刊,是北京共产党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最早的通俗读物,在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劳动音》经常刊登一些评论、诗歌和国内外劳动界的消息。到1920年12月5日,该刊已发行到第五期,每期能销售两千份左右,在华北一带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据该刊主编邓中夏回忆:“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①这个回忆,除刊名不同外,其余是和《报告》中的说法一致的。

《北京报告》中误记的《劳动者》是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出版的,以工人为宣传对象、以启发劳动阶层社会觉醒和社会运动为主旨的周刊,目前知道的终刊时间是1920年12月12日。《北京报告》发生这样明显错误,很可能是翻译时搞错了。

第十,“去年五一”系“今年五一”之误。《北京报告》中说“……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此处所述“去年五月一日”,即1920年5月1日的情形,与长辛店工人活动的实际不符。

1920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并未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更没有游行,只是在“五一”前一天晚上,由车务见习所的学生向工人们讲了讲五

一劳动节的历史,5月1日散发了题为《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以为纪念。

《报告》中描绘的场面,应是1921年5月1日的事情。这一天,长辛店一千多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会上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散发了小册子:《五月一日》和《工人的胜利》。大会做了成立工会等三项决议,并提出了“工作八小时”的主张。会后工人们开始了游行示威,他们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劳工万岁”“五一节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和雄壮的歌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邓中夏曾写道:“1921年1月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不到半年,5月1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因此,《北京报告》中的“去年五月一日”系“今年五月一日”之误。

第十一,《曙光》杂志和它的负责人。《北京报告》说“《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曙光》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出版的青年刊物之一,1919年11月创刊,主要编辑者宋介,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王晴霓等。《曙光》杂志早期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提倡科学、教育救国,介绍唯心主义思想。1920年底,由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刊的倾向有所改变,开始刊载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刊登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这类文章从该刊一卷六号起到终刊时止,共有二十多篇,包括《新俄罗斯之建设》(宋介),《彼得·克鲁泡特金与苏维埃》(郑振铎译),《俄国革命纪念》(瞿秋白译),《过渡时代之经济》(列宁),《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列宁之演说》,《彼得格勒之食粮的分配》(宋介译),《赞列宁》(高尔基)等。正如《北京报告》中说的,“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论述了劳动、阶

^① 《“一大”前后》(二),第80页。

级斗争、社会制度的改造等问题。李大钊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两篇重要文章，前文论述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重要和必要性，后文驳斥罗素“中国需要振兴实业”，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同期还发表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何孟雄的文章：《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这些即《北京报告》中所说“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进行有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北京报告》中提到该杂志“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这个同志应是指主编宋介。宋介，1893年生，1918年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1919年创办《曙光》杂志社，为该刊的主要负责人。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北京共产党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① 1921年三四月间帮助建立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沈阳一中中学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捕变节。七七事变后，任北京维持会委员、济南道道尹等伪职。194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5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处以死刑。^② 就多数《曙光》杂志社成员的思想发展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刊载文章内容多样，因此该刊一直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1921年6月《曙光》出版到第9期后终刊。

六、各地方组织报告的特点和作用

从已经看到的中共一大上北京、广州地方组织报告的文献和其他渠道得知的各地方组织的汇报情况，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共建立初期，党内的严密组织和党员的勃勃生机。通过分析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了解这些报告的特点和它们在党的日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坚定奋斗目标。通过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代表们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

识还有不同，在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抵制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方面做法还不一致，但所有的报告都因此更明确、更坚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对共产党性质和阶级属性的认识更加清晰。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为中共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党的纲领的制定又为各地方组织的工作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如同树立起一面旗帜，使一大后各地的工人运动、反帝风潮蓬勃兴起，党员迅速增加，各地方组织更加壮大。

第二，注重调查研究。在接到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各地方组织都做了紧张的准备。除了酝酿参加人选和准备意见之外，总结本地组织的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各地负责人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汇总了集体和组织成员已经完成和准备进行的工作，有的还对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众的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甚至提供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事例和数据。在党的成立初期，在非法的秘密状态下，在人员很少，有的地方只有四五个人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实事求是新风。我们看到的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没有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表态，报告不遗漏也不夸大已经取得的成绩，不隐瞒本地工作的弱点和主客观存在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态度，使得党在创建初期就有了一条比较好的思想路线，这是与其他政党区别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第四，互相学习交流。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从1920年夏天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到一年后的中共一大，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陈独秀、李大钊的穿针引线外，各地方组织之间的来往是

①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第207页。

②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4页。